

试论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形象

樊海涛 (云南省博物馆)

摘要：本文分类介绍了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形形色色的怪兽形象，对它们的不同文化渊源分别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它们中有的属于滇国地方文化的独特产物，有的则是和多种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是众多异域怪兽形象出现在滇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还将滇国怪兽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两者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关键词：滇国；怪兽；文化渊源；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4-0046-07

滇国青铜器以写实见长，社会生活、人生百态、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均以鲜活的姿态活跃在各种青铜器图像中。在滇人现实主义的笔触下，一些怪兽形象突兀地出现，引人注目。本文就此作一些初步探讨。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龙、凤等图像则不在讨论之列。

一、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形象

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形象多为写实风格^[1]，按照其基本形态，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形制：

1、虎形怪兽，分三式。

式：见于晋宁石寨山第7号墓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银错金镶石带扣（M7：72）上，为有翼虎形怪兽。



图一 有翼虎银带扣

该带扣银质，上有弧形空槽以引带，有带齿以扣孔，结构与今天我们使用的皮带扣相似，使用锤碟工艺形成突起的虎纹装饰，虎肩部有双翅，虎目镶嵌以黄色琉璃珠，虎身还使用绿松石小珠子飞金片等镶嵌装饰。有翼虎的右前爪持一枝状物，身后山石、卷云作缭绕翻腾状。

式：凡三见，为虎身水獭头怪兽。两次出现于晋宁石寨山第6号墓出土的一柄西汉时期刻纹铜剑（M6：21）刃部。



图二 刻纹铜剑上的人物、虎形怪兽、猴子

该铜剑刃部两面均刻一手持短剑的滇族男子与一种头部如水獭形状的虎身怪兽相搏，另有一猴前爪拖住兽尾，张口欲噬。怪兽白头颈以下与老虎无异，有爪、身带条形虎斑、长尾，但头颈以上花纹一改虎状条形而呈点状，头部细圆，小耳，吻部突出，模样与水獭极似；另一次出现于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残铜鼓（M13：3）鼓腰部。该鼓鼓腰装饰的刻纹图像中也有类似的虎身水獭头怪兽扑噬峰牛的造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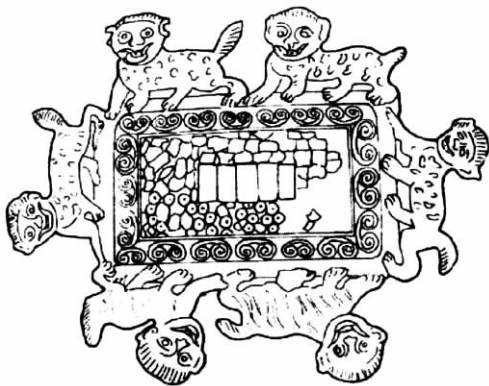
式：凡三见，为虎身狐头怪兽。均见于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出土的西汉时期两柄刻纹铜剑（M13：172；M13：219）刃部。刻纹铜剑（M13：172）刃部两面的图案均为一手持短剑的滇族男子与一种头部如狐狸的虎身怪兽相搏，另有一猴前爪拖住兽尾，张口欲噬。这种怪兽身躯与虎无异，但头部上阔下窄，大耳直立，犹如狐狸。另一柄刻纹铜剑（M13：219）刃部刻一类似怪兽，尾后还有一蜜蜂。

2、豹形怪兽

豹形怪兽仅一见，为豹身狐头造型，出现于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的一柄西汉时期刻纹铜剑（M13：219）刃部。即前文所提到刻有虎身狐头怪兽铜剑刃部的另一面。这种豹形怪兽形象与虎身狐头怪兽很相似，仅躯体改虎的条状斑纹为豹的点纹，颊旁带长髯，另有一猴子抱其尾，张口欲噬。

3、狮形怪兽，分三式。

式：见于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长方形扣饰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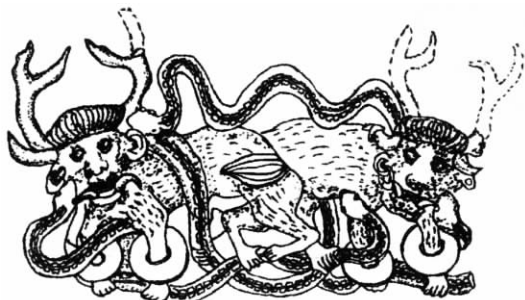


图三 长方形扣饰边缘的狮形怪兽

该扣饰四周逆时针环绕着六只狮形怪兽做装饰。这些狮形怪兽头部硕大，身带三角形花纹，短尾，大耳，头上有短发竖立，圆睛、阔鼻，口部硕大，几至于耳，呲牙咧嘴，牙齿呈锐角三角形，锋利异常。

式：见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的鎏金二怪兽扣饰（M13：227A）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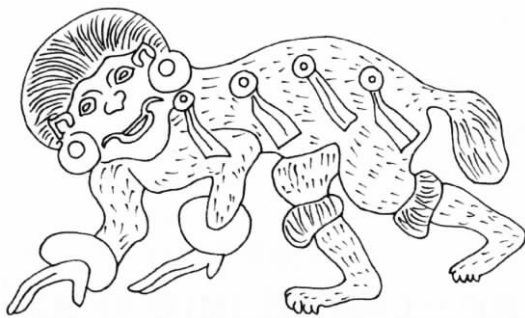
该扣饰由两只狮形怪兽构成，它们背身而立，头上巨角叉桠如鹿，长发上指，面容似人，圆睛、阔鼻、巨口，口中有两只獠牙倒突于唇



图四 鎏金二怪兽扣饰

外，足踏两条巨蟒，背上还有一条巨蟒蜿蜒爬行其上，状极凶残。两只怪兽的耳朵和前爪上还装饰有大耳环、宽边玉镯等物。

式：见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狩猎场面叠鼓形贮贝器（M71：142）器身刻纹图像中。



图五 贮贝器腰部的狮形怪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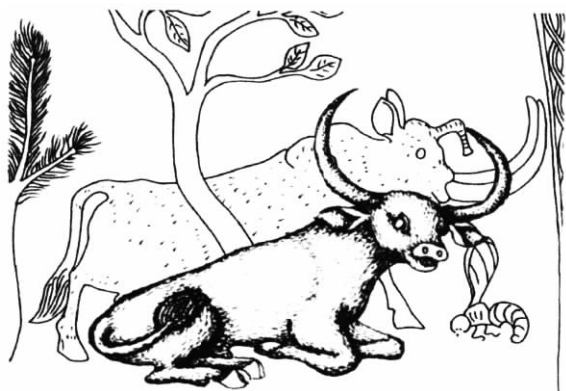
这只狮形怪兽手臂如人，但足部却长着锐利的兽爪。“头发”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小尖耳、圆睛、阔鼻、巨口，口中有两只獠牙突于唇外，耳戴玉环，手戴宽边玉镯，背上有四枚“勋章”似的装饰物，小腿上还缠裹着一条装饰束带，面带微笑，神态和蔼。

4、牛形怪兽

牛形怪兽仅一见，出现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狩猎场面叠鼓形贮贝器（M71：142）器身刻纹图像中，位于叠鼓形贮贝器下层铜鼓的鼓腰处，身前还有一头半圆雕的卧牛掩映。这头牛形怪兽蹄足、长尾飞背有驼峰隆起，但头部无牛角，双耳竖立，鼻子与吻部之间长着两只长长的、向上弯曲的牙齿，与象牙极似。它的额头上还有一古怪的突起物，似角非角，犹如头部长出了一柄短曲柄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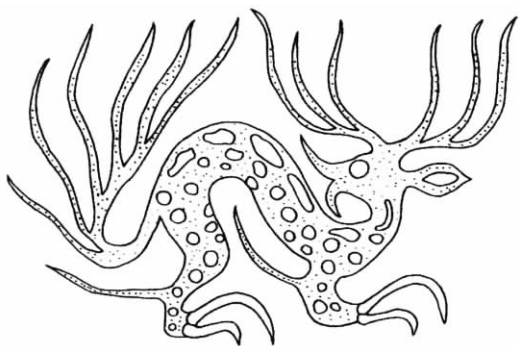
5、鹿形怪兽，分四式。

式：凡六见，四次出现在晋宁石寨山出土



图六 贮贝器腰部的牛形怪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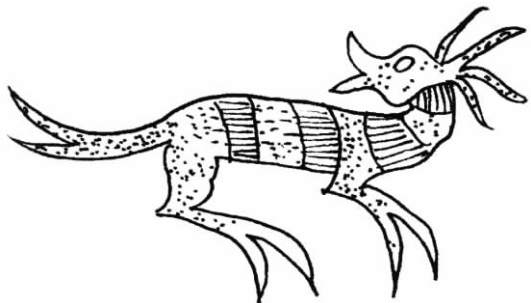
的一件西汉时期的刻纹铜鼓 (M13: 3) 鼓足；另两次出现在一件西汉时期刻纹铜剑 (M13: 233) 刃部以及一件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晚期的刻纹铜臂甲上 (M13: 4)。鹿形怪兽身形如鹿，躯体花纹呈竖条带形与点纹相杂。角、尾蔓延如水草状，唇部剧张而卷曲、大耳、兽爪，均作回顾造型。



图七 铜鼓足部的鹿形怪兽

式：凡两见，均出现在晋宁石寨山出土刻纹铜鼓 (M13: 3) 鼓足，造型与 式相同，仅躯体花纹呈三角条纹状。

式：仅见于晋宁石寨山出土刻纹铜鼓 (M13: 3) 鼓足，造型与工式相同，仅躯体花纹呈圆形点状。



图八 铜臂甲上的鹿形怪兽

：仅见于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刻纹铜臂甲上 (M13: 4) 上，长喙，长角，尾分两岔，足如剪刀，躯体花纹呈横条带形与点纹相杂，作回顾造型。

二、怪兽图像的文化渊源初探

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派的理论先驱莱奥·弗罗贝纽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文化没有脚。这意味着文化是靠人们的传播而对人类产生影响^[2]。如果我们像“泛埃及主义”一样用把埃及看作人类文明的摇篮、惟一的文化辐射源的方式去探索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的文化渊源，那么肯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但如果我们无视这些怪兽图像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种种相近、相同或相通之处，而执着于“土生土长”的解释，那更会被讥为掩耳盗铃。解决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之源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现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资料尝试着分述于下：

1、虎形怪兽

有翼虎银带扣上的翼虎形象在面世之初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对银带扣的来源有两种意见：一是发掘报告所称：“它可能是经波斯、大夏等国输入西南夷的”，大多数人都赞同此论，有学者考证其产于西亚或印度，传播途径是蜀身毒道^[3]；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带扣“纯属汉地工艺作风”，“不能因此虎纹有翼就把它视为外来之物”^[4]。虽然这两种意见相佐，但都承认带扣上有翼虎的造型非滇国自产而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虽记载过汉益州郡出银^[5]，但炼银工艺需要采用灰吹法，很难掌握^[6]。石寨山出土众多文物中，银器为数不多，除此银带扣外仅出土银饰片 (石甲 M12: 142)，银丝 (石甲 M13: 349)，银发针 (石甲 M13: 29) 等寥寥几件^[7]，可见西汉时期滇国银矿产量极低，银器并不普及。有翼虎银带扣工艺精湛，错金工艺飞镶嵌琉璃、绿松石等多种“宝石”的装饰手法也很特殊。据考，这种在动物身体局部布置凹叶纹以镶嵌宝石的方法出自于西伯利亚地区，为斯基泰的动物纹饰所特有^[8]。带扣为游牧人所习用，有翼虎前爪所持的“三株树”也体现出典型的西亚

文化特征^[9]。所以这件有翼虎银带扣应属外来之物。

有翼兽的造型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神话中的“格里芬”(Griffin),即“狮身鹰翼怪兽”也源自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地区,它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影响深远。我国有翼兽的造型也出现得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赵宝沟文化中^[10],但是赵宝沟文化中的有翼兽形象在继后文化发展中的传承及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有翼兽的艺术造型大量出现,与北方草原文化盛行一时有关^[11]。2003年,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曾发现过西汉时期鄂尔多斯式镂空铜饰牌,证明当时北方骑马民族已经到达过西南地区^[12]。滇国青铜文化中的游牧文化因素,早已被有识者所论及^[13]。

有翼虎造型传入滇国的渠道确实存在南、北两种可能。目前看来,周邻地区并未发现类似的带扣^[14],它经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进入滇国的可能性更大些。具体的文化传播路线大概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中亚、西亚地区——印度——缅甸——滇,其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和蜀地商人的活动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鉴于我国玻璃器的生产与西方分属不同的体系,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对有翼虎双目中镶嵌的黄色琉璃珠作能谱分析,那么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或许可以对其产地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曾记载有食人的凶兽“穷奇”,其状如虎而有翼,形状倒与这件银带扣上的动物相吻合。

虎身水獭头及虎身狐狸头的怪兽,从未在其他文化中发现过,滇人写实的艺术作风为我们描述的是否是一种曾经存在,但早已灭绝的怪兽呢?它们也可能仅是巫术思维下的想象产物。豹身狐狸头的怪兽同样如此。

2、狮形怪兽

中国无狮子,《尔雅》中记载过的“狻猊”,可能是我国关于狮子最早的记载。中国人真正了解狮子,应该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扇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

有月氏国遣使者贡献狮子之事^[15]。但在滇国,狮子形象出现得很早,出土“鎏金二怪兽铜扣饰”的石寨山第13号墓时代约在西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16],时间上限比张骞首通西域(公元前138年)更早^[17],这意味着早在张骞出塞之前滇人就可能对狮子这种凶猛的野兽有了一定的了解。

滇国的狮形怪兽有三种,外表相近,具体则有所区别。李家山出土的长方形扣饰上的相对写实;石寨山第13号墓出土的则头长鹿角,口有獠牙,显示出“神圣化”的趋势;石寨山第71号墓出土的明显是一“披着狮子皮的人”,因为它的前爪与后爪不同,呈人手的形状。这样的“手”我们在石寨山第13号墓出土的一件刻纹铜牌上人物造型中可以见到相同的范例。“舞狮”可能具有逐鬼驱邪之意。当然,滇人故意装扮成这种“怪兽”模样,也可能是一种用以诱捕其他野兽的特殊狩猎方式。

这三只“狮形怪兽”面部不约而同地都作正面表现,五官清晰,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世界闻名的“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的艺术造型是古埃及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埃及人称之为“沙斯布·安赫”,意为“栩栩如生的形象”,阿拉伯人称之为“恐怖之父”^[18],更能体现它的内涵。希腊文化中的智慧女神的斯芬克斯(Sphinx)也是狮身人面的造型。所以滇国出现的这三只狮形怪兽,虽然都是本地“制造”,但它的文化渊源却来自遥远的两河流域,通过中亚、西亚、印度、缅甸,辗转来到滇国。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为遥远文化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国际通道。

3、牛形怪兽

牛是滇人重要的肉食来源,还是财富的标志。滇国青铜器中最常见的是巨角隆脊的“封牛”,但牛形怪兽在成千上万的滇国青铜器图像中仅此一例,弥足珍贵^[19]。这种怪兽真的在现实中存在吗?我们很难回答这一问题。从狩猎场面贮贝器器身的刻纹图像的艺术表现手法看,滇人在表现这头牛形独角怪兽的同时,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周遭树木飞天空飞禽的生动形象。滇人善于表现现实生活场面的艺术特点,所以这种“牛形独角怪兽”也许真的曾经在滇国存在过,

只是随着物种的灭绝而消失了。

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头“牛形独角怪兽”是出于滇人对“大象”向往而虚构出来的产物。滇国青铜器图像中我们从未见过大象的身影,但在石寨山第1号、第12号墓出土文物中,我们曾发现过少量类似象牙的残留物,所以滇人很可能只见过象牙而没有亲眼目睹过真正的大象,仅凭道听途说而“捏造”出了这头长着象牙的“牛形独角怪兽”,其头部的“独角”,可能还融合了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麒麟的一些特征。汉代人认为麒麟是麕身、牛尾、狼额、马蹄的形象,雄曰麒而无角,雌曰麟而有一角,角端有肉^[20]。《史记鲁西南夷列传》记载,滇国以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其地有“滇越”。乘象国一般认为是在今腾冲一带,但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考证“乘象国”应该是在南鸠江(伊洛瓦底江)畔由傣族先民所建立的达光国,即国际学术界所称的Ta Gaung,它是蜀身毒道上的重要驿站^[21]。这头怪兽难道就是滇人对“乘象国”大象的幻想吗?

4、鹿形怪兽

滇、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马迁甚至认为滇国就是楚人庄蹻所建。虽然我们在滇池区域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迄未发现“庄蹻王滇”的确证,但一些文物仍然隐晦地向我们透露出滇、楚文化交流的信息。童恩正先生曾撰《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一文予以阐释^[22]。滇国青铜器图像中的鹿形怪兽图案可以作为一种补证。

这种鹿形怪兽或许就是“飞廉”^[23]。“飞廉”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三辅黄图》称其形状“鹿身飞雀头、有角,蛇尾、豹文,能致风呼号也”。《楚辞·离骚》记载:“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证明它与楚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湖北随县曾侯乙墓葬中出土的马面帛上曾发现过类似的,“水鹿”图案。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臂甲上的鹿形怪兽,身后有猛虎追逐,“虎——鹿”的食物链关系出现在防御甲冑上,不但是现实的写照,其中还蕴含着“万物相生相克”的哲理,具有厌胜意义^[24]。

当鹿形怪兽的长喙、利爪愈加明显,角、尾演变如水草蔓延后,这种食物链的组合在铜鼓足部装饰图案中的连续出现,我们就不能再归结于艺术表现风格化的原因。此时,它以飞奔的姿态(风神)变成了一种引魂升天、化生的文化象征。楚墓中常见的镇墓神兽,许多造型都头戴鹿角,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飞廉”有一定的渊源^[25]。

鹿性警惕,时常回顾以预防猛兽袭击,“鹿回首”的造型不仅是鹿性机敏的写照,而且它长喙利爪、回转头的造型,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北方骑马民族文化中。鸟喙鹿身的怪兽形象,从东周至秦汉多见于我国鄂尔多斯地区以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艺术中,是斯基泰——阿尔泰艺术的常见题材。前苏联学者在研究蒙古、外贝加尔、图瓦、阿尔泰等地的鹿石时,分析了鹿石上的一些细部特征,指出“回首”的动物造型“这种母题在鄂尔多斯(公元前六~五世纪或更晚)广泛流行。上面列举的所有动物形象(金麦里、高加索、米奴辛斯克和鄂尔多斯)的一般特征(头向后翻转、口张开,刻画出耳朵,尾巴翘起,爪呈利爪状),说明这种母



图9 米奴辛斯克盆地出土铜斧上的雕刻

题有一致的渊源。”^[26]滇国的“飞廉”,鸟喙鹿身兽爪,角尾极度夸张,回首奔逸,与之有几分相似,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联系。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滇国怪兽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一种是完全土生土长起来的,主要指虎身水獭头、虎身狐头的怪兽和豹身狐头的怪兽。另一种是与其他文化交流的结果。“其他文化”所指范围很广,包括中原地区、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地区,甚至可达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三、滇国怪兽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象比较

欧亚草原文化素以丰富的动物纹样 (animal style) 闻名于世, 怪兽纹样是其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虽与欧亚草原可能存在不同的起源, 但战国~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东征西战, 使它们的艺术风格显示出很大的相似性, 两者间关系密切^[27]。“鄂尔多斯及其临近地区的古代艺术中, 在战国偏晚时期突然出现别具风格的怪兽形象是斯基泰——阿尔泰艺术影响的结果。”^[28]就时代而言, 它们比滇国青铜文化都要早。滇国怪兽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象相较, 共性和差异并存。

在表现题材上, 两者都出现了有翼兽、狮子、鹿等, 但滇国的牛形怪兽、虎身水獭头、虎身狐头和豹身狐头的怪兽都未见于其他地区, 显然属于滇国独有的地方性文化因素。

在构成方式上, 怪兽形象都是采撷几种动物的局部特征组合而成的, 但欧亚草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狮鹰合体”的鸟喙格里芬形象在滇国不曾发现, 怪兽——食草动物的组合不过一例, 仅见于石寨山第13号墓出土的残铜鼓腰部, 它的造型是怪兽跃起, 张口咬住牛的额头, 牛伫立不动, 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食草动物组合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大相径庭。怪兽扑噬后肢翻转的食草动物的造型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流行一时, 在滇国却从未出现过。滇国怪兽——人的组合方式显得很独特。

在物质载体上, 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出现各种器物上, 有铜盘、铜饰牌、金箔、金饰片、飞金冠、金项圈、飞石雕、象牙雕刻、毛毯乃至人体文身^[29], 怪兽有圆雕、透雕、浮雕、半浮雕、平面等, 为数众多, 形式多样。滇国怪兽则仅出现在带扣、铜扣饰、铜鼓、贮贝器、铜剑等少数器物上, 主要有透雕、浮雕、平面几种形式。

在社会文化性质上, 怪兽形象在欧亚草原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们的中心思想来自萨满文化中活泼不屈的生命力^[30]。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它们也是图腾崇拜的产物, 象征着权力和地位^[31]。可见, 怪兽形象和动物纹样一般, 根

植于游牧文化的土壤中, 同游牧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滇国青铜文化是在土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元的复合型文化。它以稻作文化为基础, 其中掺杂了大量的游牧文化因素^[32]。滇国怪兽仅出现在铜鼓、贮贝器、扣饰、铜剑等重要器物上, 数量少、工艺精, 带有明显的“炫耀”意味, 和“图腾崇拜”并无多大关系。它们要么直接从异域传采的, 如有翼虎银带扣; 要么是滇人以审视“文化他者”的猎奇目光引进的^[33], 如狮子、长象牙的牛; 要么就是艺术“移情”作用下的想象产物, 如虎身水獭头的怪兽、虎身狐头和豹身狐头的怪兽, 在滇国社会文化中只属于边缘性文化因素而不是构成社会文化的主流。

总之, 滇国怪兽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象似有关联, 但它们不大可能是从欧亚草原直接传入的。如果是直接影响的话, “狮鹰合体”的格里芬、怪兽扑噬后肢翻转的食草动物等形象势必要在滇国艺术中留下蛛丝马迹^[34]。我们也不能忽视两者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似点。童恩正先生提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型文化传播带中古代文化存在着内在联系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明^[35]。春秋战国时期氐羌等游牧民族的南下无疑为南北文化的进一步沟通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据人类学观察, 当时活跃在滇西——滇中地区的“昆明人”中就包含少量的西方人种。草原文化与滇国的接触可能就因此而来^[36]。民族迁徙带来的文化冲击波不仅层层激荡着遥远的滇国艺术, 而且在传播过程中自身也不断发生着改变、变异。滇人在借鉴的同时, 不乏创新与再造, 所以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 让人似曾相识, 又独树一帜。

滇王在接待汉武帝的使者时, 曾闹过“汉孰与我大?”的笑话, 司马迁分析这是因为道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缘故。滇国青铜器图像中出现的这些匪夷所思的怪兽造型, 无疑给予了我们全新的启示。中外文化交流之久远深广, 远逾我们的想象之外。

(本文图片分别采自《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国文物精品集》、《滇国青铜艺术》、《云南文物》, 其余由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提供。图五、图六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家全先生绘制, 谨此致谢。)

注释：

[1] 晋宁石寨山第6号墓出土的兽形金饰片实际上是夔龙的形象，故不论。其造型可比较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第44~45页所载安徽寿县蔡侯墓地出土春秋时期嵌红铜夔龙纹铜敦上的夔龙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 谢健民：《文化传播：模式及其过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3] 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的西亚文物》，《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333~34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4] 孙机：《滇文物小记》，《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国文物精品集》第1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 《汉书·地理志》：律高，西石空山出锡，东南蓝町山出银、铅。

[6] 古代炼银多采用伴生辉银矿达到一定数量的方铅矿，所谓灰吹法指利用铅容易被氧化成PbO及PbO可被排出或被炉灰吸收的性质而把金银从铅中提取出来的技术。孙淑云主编《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第51~54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

[7] 另有一件错金银饰片（石甲M12：141）实际为银铜合金，银含量达10%以上。李晓岑、朱霞著《科学与技艺的历程——云南民族科技》第9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8] 杨孝鸿：《欧亚草原动物纹饰对汉代艺术的影响》，《艺苑》1998年第1期。

[9] 叶舒宪等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中西方文化碰撞》第161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 顾问、黄俊：《中国早期有翼神兽问题研究四则》，《殷都学刊》2005年第3期。

[11]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12] 《三峡地区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带扣》，《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日。

[13] 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201~21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 云南发现的类似带扭仅1999年在官渡羊甫头采集的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他地点主要有朝鲜平壤、新疆焉耆以及广州、日本等地，时代都在汉代。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15]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是岁（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

[16]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32~134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17] 张騫出使西域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13年后他才回到长安。

[18] 萧兵：《避邪趣谈》第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9] 这头怪兽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家全先生发现并

绘图，谨此致谢。

[20] 《尔雅·释兽》：“麀，麀身，牛尾，一角”。麀即麟；《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索引》：张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状麀身，牛尾，狼蹄，一角”；《说文解字》：“麒，仁兽也，麀身牛尾一角；麀（麟），牝麒也”。段玉裁注云：“状如麀，一角，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广雅·释兽》；《左传·哀公13年》，杜预注；《汉书·武帝本纪》，颜师古注等均有类似记载。

[21] 杨永生：《“乘象国滇越”考》，《思想战线》1995年第1期。

[22] 童恩正：《南方文明》第525~557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23] 易学钟：《试述古代铜鼓的社鼓职能（之二）——铜鼓主题纹饰新探》，《铜鼓和青铜文化新探索》第99~10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24] 李伟卿主编：《云南民族美术史》第52页，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

[25] 王政：《楚墓中的“镇墓兽”、“风伯飞廉”与“遗痕律”》，《战国前考古学文化谱系与类型的艺术美学研究》第195~19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 [前苏联] 萨维诺夫等《鹿石分布的西界及其文化民族属性问题》，《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三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80年编印。

[27] 田广今、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19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28] 乌恩：《略论怪异动物纹样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3期。

[29] 参见郭物：《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一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30] 参见郭物：《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一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31] 姜涛：《试论鄂尔多斯战国墓出土的怪兽形象》，《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包桂英《北方系青铜器动物纹饰与北方民族审美文化》，内蒙古师范大学2005年民族学硕士学位论文。

[32] 参见张增祺：《长江上游璀璨的滇国青铜文化》，《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33]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审视时，对于非我的异文化往往会不自觉的怪异化或乌托邦化，使之偏离了原始的面目。参见叶舒宪等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中西方文化碰撞》第146~16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34] 孙机：《滇文物小记》，《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国文物精品集》第1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5]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型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36] 谢崇安：《略论西南地区早期平底双耳罐的源流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